

哲學研究的困境與挑戰

鄧育仁*

容我從三個談話說起。有一次，在聊天的場合，有一位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研究和學術行政都歷練豐富的學者委婉地問起：「哲學研究就是讀書嗎？我們學校裡的哲學教授好像都是這麼說、這麼做的。」

另有一次，也是聊天的場合，一位研究臺灣史的資深學者反問：「臺灣有哲學史嗎？」當時，這個反問是在回應我隨口提及的學界近況：有一群哲學家正在辛苦挖掘臺灣哲學史。

再有一次，是在正式開會前還鬧哄哄的場合裡，一位很資深、很有聲望的自然科學家說：「人文是個好東西，要協助科學普及，要多多幫襯科學研究。」他似乎還補上一句：「人文有學術嗎？」不過，當時我沒聽清楚，不太確定。如果我沒聽錯，這就不只是補上一句，而是補上一刀了。

有時候，聽聽領域外的學者怎麼閒談自己的專業領域，雖然初步聽來很是令人無語，不過，仔細去揣摩，倒是一種從「新」的角度來反省自己領域的機緣。先從第一個談話來說。在臺灣，粗略來分，哲學有中國哲學、歐陸哲學、英美哲學三大塊，當然還有印度哲學、日本哲學，以及其他的哲學分類方式。就我個人的學術訓練背景來說，就常常被分在英美哲學這一塊。就專業領域來說，我給自己的定位則是在政治哲學、心智與語言哲學，以及認知科學的哲學。不過，無論怎麼分類，或怎麼定位，總體給人的印象似乎就是讀書，或用比較行家的話來說，就是文獻閱讀、文獻詮釋、文獻批判，就是在文獻中找問題，展開分析、詮釋與批判，並解決或消除問題。哲學工作者似乎沒有必要再去思考實際的問題，或沒有餘力去關注實際的問題。更嚴重的可能是有的哲學工作者只讀自己學圈內的文章，做自己學圈內認為重要的問題研究。容我在此簡短明白這樣宣示：文獻閱讀、文獻詮釋、文獻批判都很重要，但哲學研究不只如此。但，假設總體給那位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印象有幾分真實性，或者說，哲學在臺灣的確有這種和現實之間的脫鉤，或只在自己專業文獻內研究的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情況，這的確需要哲學家好好正視、認真面對的。需要好好正視、認真面對的問題，需要有個名稱。容我用「內捲化的問題」來稱呼這種過度集中在閱讀哲學文獻，詮釋哲學文獻，檢討哲學文獻裡的邏輯、論證以及其他種種的問題，而沒有時間和餘力去思考或關注實際問題的問題。

接著就第二個談話說說。「臺灣有哲學史嗎？」這個反問，應該是一種間接表達，言下之意是「臺灣沒有哲學史可言」。這個間接表達出來的意思，有幾分真實性。過去，臺灣當然有許多人從事哲學研究，成績還頗為可觀，例如百年來留學歐洲、美國、日本的人，以及遊歷中國的臺灣學子和來自中國的學者，留下許多重要的著作。然而，如果說哲學傳承是哲學史的主心骨，而經典是定位哲學傳承最核心的部分，那麼，說臺灣沒有哲學史是有幾分道理的。立足臺灣放眼全球來想想，我們讀過的哲學史，古典希臘有柏拉圖、亞理斯多德的經典作品，近代德國有康德、黑格爾的經典作品，法國有笛卡兒以降諸多的經典作品，英國有經驗主義、效益主義而美國則有實用主義的經典傳承，但臺灣還沒有那種被公認為是深刻的、能打開觀念格局甚且開創新局並通過時代考驗的哲學經典之作。沒有經典傳承的哲學史，怎能稱得上哲學史呢？我想有人還會加上一句：沒有哲學史的國度，怎能稱得上走進人類歷史當中並擁有立國精神支撐的現代文明國度呢？容我稱這種沒有自身思想底蘊的經典傳承的問題為「經典缺位的問題」。

再來就是第三個談話了。上面說到，「如果我沒聽錯，這就不只是補上一句，而是補上一刀了。」「補上一刀」是個譬喻，但很傳神地說出一個不只關涉哲學研究的大問題。容我長話短說，希望是能點出重點的長話短說吧。以西方哲學的傳承來說。中世紀的世代，基督宗教信仰是支撐文明的主要力量。當時有一句名言：哲學應該如同婢女服侍主人般為神聖的經典服務。這句話後來就以更簡潔的「哲學是神學的婢女」而廣為流傳。我們知道，科學革命以後，直到現在，二十一世紀了，科技（科學與技術）已經取代基督宗教信仰，成為支撐西方乃至全球文明的主要力量。在美國，有所謂科技與人文的戰爭。科技明顯占上風，以科技為準而展開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似乎就要把人文擠出文明的主要舞臺，或把人文收編入自己的框架之中。科技儼然已經成為地球文明的新霸主。上面提到的那位很資深、很有聲望的自然科學家的話語，聽起來，就是站在新霸主這一邊，客氣地說出類似中世紀神學家的那句名言。直白地不太禮貌但傳神地來說，大概可以這麼改寫：人文是科技的婢女，哲學則是眾婢女中的一位唄。我可以想像，如果真地這麼直白說出來，那位自然科學家很可能馬上說：「喔！不，不，我沒這個意思。」是的，在二十一世紀，大家都

要平等相待。只是，不過，科技研究還是主導著學術的大方向，包括對社會和政策的影響、學術資源的分配，以及各種適當的和不適當的話語權。我本來為了要紀念中世紀那句名言，要給上述這個新霸主引起的問題取名為「科技的婢女問題」。不過，這麼命名有違二十一世紀平等精神的要求。因此，就直接以「科技與人文的問題」來表示。

內捲化的問題、經典缺位的問題，以及科技與人文的問題，對哲學研究在臺灣來說，不是三個分別各自獨立的問題，而是相互牽連在一起的問題。容我從另一個角度試著來描述以上三個問題是如何相互牽連在一起。臺灣目前約略有二千三百多萬人口。這樣的人口基數，難以支撐起足以高度自主的學術社群。這意味著哪些算研究問題、哪些是重要問題、哪些是重要的或必讀的文本，以及哪些觀點框架了問題的起點和思考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決於臺灣的學術社群。臺灣必須跟著世界走，參與進世界的學術格局和方向裡。在現實上，這表示臺灣必須在歐美主導的學術格局和方向裡，去尋找自己的利基，或創造自己可以在其中發揮的地方。科技在臺灣的地位反映了科技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科技與人文的問題也是。哲學呢？在臺灣，哲學工作者必須付出巨額的時間和精力，去研讀並跟上歐美哲學的議題和方向。然而，歐美哲學的議題和方向，跟歐美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情境問題和情勢變化，息息相關，或跟科技在歐美的前沿發展，高度扣合。許多時候，跟上了，參與進去了，發表研究成果了，但抬頭一看，發覺還需要再跟上。畢竟，議題是由他們設定，方向是由他們定調。因此，很多時候的研究是閱讀他們的文獻。因此，內捲化的問題總一直在。由於研究總在跟上跟進，經典缺位的問題總難以克服。不過，有問題，並且看到問題，就有機會看到轉機，就有改變的可能性。

跟進跟上是重要的。不過，跟進跟上的重點，不是成為跟班，而是要善用歐美的學術資源，來克服臺灣人口基數規模太小的問題，並調節內捲化的問題、經典缺位的問題和科技與人文的問題。臺灣的哲學社群雖小，但還是有一定的學群力量，可以分進合擊，相互協調，分工合作。回頭看看想想，其實臺灣的哲學社群，就其規模而言，已經做得相當不錯，而且好些地方可以樂呵一番了。就個人所見，有兩個地方需要增能增強。第一個也是首要的，還是經典缺位的問題。我在中研院歐美所工作，就容我扼要說說歐美所的做法。首先，是人才第一。人才需要靠延攬，很重要地，還要自己來培養。人才不是延攬過來扼殺的。培養人才更不是指手畫腳地告訴年輕晚輩要怎麼怎麼做，而是建置良好的學術環境，提供學術資源，需要時能適時適切從旁協助的機構氛圍。其次，制度上鼓勵年輕學者參與學術口碑良好的國際會議，在學術聲望高的國際

期刊發表論文。制度上鼓勵獲得長聘的研究人員，去做重要的、需要長期投入的議題，以立足臺灣放眼歐美的發言位置和眼界，著書立說。如此一來，如果能一一做好，有了人才，有了良好的學術環境和氛圍，有參與進國際學術競爭和善用國際學術資源的連結，再有足夠充分的時間和投入，去著書立說，相信重要著作會一一出現。有了重要著作奠基，就有出現經典作品的條件了。如果再有經典作品支撐，歐美所乃至臺灣，就能成為具有主題特色和學術傳承的重要基地。

第二個需要增能增強的地方，是編寫或書寫立足臺灣放眼全球的哲學教科書。個人認為，好的學研環境，需要建立經典傳承，也需要讓新人新生在加入或考慮加入其中時，就有很好的、很扎實的、可以深入淺出又能縱覽全局的憑藉，也就是適合臺灣哲學發展的好的教科書。教科書的編寫需要與時俱進。然而，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教科書。編寫教科書需要市場支撐，還需要有人願意投入。除了市場太小的問題之外，目前對學人的新聘、升等、獎勵等等制度措施，是不鼓勵學人編寫教科書的。如何克服這個問題，並革新制度，真需要學者們以群體的力量來思考和推動。如果可以成立臺灣哲學館，先由臺灣哲學館來主導，或許能事半功倍。

最後，容我說幾句個人選擇的研究和作法。我在歐美所從事哲學研究，除了個人興趣外，總要去思考如何善用歐美所的優勢，去寫出有機會成為重要的乃至經典作品的哲學著作。我選擇美臺中關係的情勢作為哲學反思的切入點。由現階段美中變局來看，臺灣落在全球一個特別的位置。我想說的不是地理的、經濟的或軍事的戰略位置，而是文明的位置，是美國主導的歐美文明和東亞傳承的古典文明邊緣交會的位置。邊緣的位置總有其特殊性，就有待「邊緣人」自己去發掘。由邊緣，特別又是兩大文明邊緣交會的位置，我們其實更有機會看出文明的慣性，以及它們所賦能的但同時也約束的局中人有怎樣自己難以察覺的思考盲點。我嘗試由此去發掘一種值得發展，以臺灣為起點，對臺灣重要，對現在刻正展開的美中變局重要，對地球生命文明也有其重要性的哲學新觀點和新典範。在我看來，美中衝突，除了政經軍外，更根本來說，是文明和價值的衝突。由臺灣的發言位置，對此衝突提出深刻的哲學反思，是值得好好做好的一件事。這些年來，我發展了一種由公民視角展開，以心智多樣性為立足點，同時善用並發展「重新框架觀點、重新設定問題」的論述方法的哲學論述。我稱這種哲學探究為「公民哲學」，寫了一本《公民哲學》，並持續拓展深化中。就以此自道並與哲學同行相互勉勵吧！